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日〕藤田胜久 著

曹峰 〔日〕广濑薰雄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日〕藤田胜久 著

曹峰 〔日〕广濑薰雄 译

《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日)藤田胜久著;曹峰
(日)广濑薰雄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4827-9

I. 史... II. ①藤...②曹...③广... III. ①史
记-研究 ②中国-古代史-史料-研究-战国时代
IV. K204.2 K23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241 号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日]藤田胜久 著

曹 峰 [日]广濑薰雄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25 插页 2 字数 388,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4827-9

K·1039 定价:42.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藤田胜久

1950年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大学毕业于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后期博士课程学分修满后退学。1998年凭《〈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爱媛大学法文学部教授。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主要著作有《司马迁及其时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司马迁的旅行》（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中国古代国家与郡县社会》（汲古书院，2005年）、《项羽和刘邦的时代》（讲谈社，2006年）等。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 追寻一己之福

——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 蒲慕州著

◆ 西周的灭亡

——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美] 李峰著

◆ 《史记》战国史料研究 [日] 藤田胜久著

◆ 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 [日] 工藤元男著

◆ 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 [美] 班大为著

◆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 [美] 夏含夷著

◆ 从礼仪化到世俗化

——《诗经》的形成 陈致著

◆ 古巫医与“六诗”考

——中国浪漫文学探源 [美] 周策纵著

责任编辑：童力军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朱渊清、陈 致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渊清	[美] 李 峰	[英] 汪 涛	[美] 张立东
陈 致	[日] 高木智见	唐际根	曹 峰

丛 书 序

“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长期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指汉代灭亡之前(220)的中国研究,或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研究,此一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于1975年创办 *Early China* 杂志为标志,“早期中国”这个学术范畴基本确定。哥伦比亚大学近年设置的一个常年汉学讲座也以“早期中国”命名。

“早期中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广大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帝国建立,并且在汉代走上农业文明之路、确立起帝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完善科层选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标准,早期中国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早期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塑造了此后长期延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编户齐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维系;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汉化,帝国疆域的扩张主要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结果;各种宗教基本不影响政治,世俗的伦理道德教化远胜超验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导的价值观体系以及由此造就并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为传统中

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等等。追源这类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历史选择形态(动因与轨迹),对于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程,乃至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国研究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重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国研究在中西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这就是:扩充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工具、创新研究技术,多学科协同不断探索新问题。

1916年,王国维以甲骨卜辞中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部分出现在卜辞中。王国维把这种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资料在现代的早期中国研究中显示出越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 100 年来约出土 15 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 34 844 片。青铜器铭文，1937 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 4 831 件，其中绝大部分为传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录资料到 1988 年止，共著录了金文 11 983 件。此后到 2000 年，又有约 1 350 件铭文出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简帛文献资料如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定州简、阜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都以包含大量古书而深受关注。

严格地说，王国维说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还是文字资料，这些发现当时还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研究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证据。傅斯

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张结合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扩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刻开始发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请发掘殷墟的报告中说：“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从192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总面积46000余平方米，这15次发掘收获巨大：在小屯北地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在宫殿基址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约1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发现了商代王陵区，发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高楼庄后岗，发掘出了仰韶、龙山和殷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在后岗还发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还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学发掘举世震惊。中国考古学也从开创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为历史的特色和风格。为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根植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城址还是商周墓葬的发掘，都是早期中国文明具体直观的展示。

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检核，不同属性的资料相互印证，提供我们关于早期中国更加确切更加丰富的信息，能够不断地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又因为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探寻更多的资料，而使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且愈益全面。开放的多学科协同的综合研究使早期中国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其他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或许也有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的古史研究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开创了中国历

史学和中国学术的新时代。现代中国学术的进步始终是与西方学术界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传播紧密相连的。西方早期中国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评研究等等,启发并带动着中国同行的研究。事实上,开放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学者的不断交流、对话中进步的。我们举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是确认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这是用现代天文学研究解释《竹书纪年》“天再旦于郑”天象资料的一项成果。这项成果的发明权归属韩国学者,在断代工程之前西方学界已确认了这个结论。将“天再旦”解释成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现象的假说是中国学者刘朝阳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随后的董作宾先生分别推算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韩国学者方善柱据此假说并参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论证“天再旦”记录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环食(《大陆杂志》51 卷第 1 期)。此后,1988 年美籍学者彭颀钧、邱锦程、周鸿翔不仅也认定“天再旦”所记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环食,并对此次日食在“郑”(今陕西省华县, $\lambda = 109.8^{\circ}\text{E}$, $\varphi = 34.5^{\circ}\text{N}$)引起“天再旦”现象必须满足的天文条件,第一次做了详尽理论分析和计算,并假设食甚发生在日出之时,计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转变化的相应的 ΔT 为 $(5.8 \pm 0.15) \text{ h}$,将“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再次确认了“天再旦”这一成果,并为此于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网实地观测验证。

本丛书不仅是介绍西方学者一些具体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成果,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技术、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探索前沿课题的学术交流的平台。这就算是我们寄望于《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的又一个意义。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通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

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时刻,愿《早期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欢迎所有建立在丰富材料缜密分析基础上、富有独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国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长久的事业,我们只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来襄助。

朱渊清

2006/12/2

写于学无知室

中文版序言

这次拙著《〈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日文版 1997 年刊行)能够出中文版,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此向执笔翻译的曹峰、广濑薰雄两位先生,向同意提供中译本版权的东京大学出版会,向出版这部学术书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谨表由衷的谢意。尤其曹峰、广濑薰雄两位先生不仅作了极为认真的翻译,还帮助校对了本书所引的各种典籍原文,修改了本书字句上的一些错误,更要表示谢意。

我利用出土资料(简牍、帛书)从事《史记》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是 1986 年发表的《关于〈史记·穰侯列传〉的一个研究——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线索》(《东方学》71 辑)和《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结构与特征》(《爱媛大学教养部纪要》19 号)。那以后约十年时间里,我一直从事《史记》战国史料研究,其经过已在本书后记中作了介绍。

不过,本书日文版刊行之后,又已过去近十年岁月。这十年间,在中国,由于战国秦汉时代出土资料的不断发现,《史记》研究也随之出现需要补充的地方。除了本书收录的论文之外,我本人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出现。因此,借此机会,既介绍最近的研究动态和方法,也对本书的观点作再一次的确认。

司马迁撰写《史记》(《太史公书》)是在汉武帝时代,那时,汉王室收集了不少典籍。《太史公自序》说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

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匱之书”。关于《史记》的编纂，《太史公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按照这些说法，《史记》就是一部利用先期资料编纂而成的历史书。本书目的在于，看看能否利用传世文献及简牍、帛书，推测出当时书籍的形态和内容，论证出《史记》的编纂过程。这是继承了王国维所提倡的利用纸上史料（文献）和地下资料（出土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二重证据法”，以及利用考古资料来作注释的陈直《史记新证》的方法。

本书的讨论对象虽然只限于《史记》的《秦本纪》和战国世家，但我相信本书阐明了以下的观点，即《史记》的《秦本纪》和战国世家是将纪年、世系资料、记事资料（战国故事、传说等）组合起来编纂而成的。因此，今后从事先秦秦汉史研究时，如果我们以《史记》的纪年、世系资料及比较可靠的战国故事等为基础，将其与考古资料相结合的话，就能展开更科学的研究。

不过，《史记》既是一部历史书，也具有文学的特征。历来研究认为，那些文学色彩的叙述取自当时的说唱故事、传说，或是司马迁在旅行时得到的。特别是司马迁的旅行，很多研究认为其目的就是为了收集各地资料。因此我对司马迁的经历和旅行作了分析，并实地踏勘了司马迁的大半旅程。结果发现，司马迁的见闻只限于“太史公曰”的论赞部分，《史记》本文中关于实地的描述极少。就《史记》战国史料而言，以长安为中心的西方地域（秦、赵、魏等）之信息多，而其周边地域（巴蜀、楚、吴、越、齐、燕等），虽然司马迁旅行过，其信息却很少。这明确表明《史记》的素材和司马迁通过旅行得到的资料是不同的。

因此，如果重新探讨《史记》的文学性，可以说在司马迁的取材和编纂中，已经显示出其文学性的特征。就是说，《史记》的编纂方

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原封不动地利用先期资料,其典型是《史记·孙子(孙武)列传》,此篇原封不动地利用了银雀山竹简的孙子传说。所以说,司马迁等人所利用素材本身已经包含有文学性的描述。另一种编纂方式,正如本书所讨论的那样,是将纪年和世系、记事资料等组合起来编纂而成。但这不是仅仅排列先期资料就完事了,司马迁还按照他的历史观加以取舍选择。正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司马迁试图阐明盛衰和兴亡的原理,按照这一主题取舍选择先期资料,加以编纂。《史记》让我们深思国家兴亡的原理,追寻个人发迹和没落的过程,并产生一种效果,即令人体味到人生的教诲,感受到文学的情趣。

因此可以说,《史记》的写作主要以先期资料为基础,其中包括了少量当时的传说和见闻。但要注意的是,虽然司马迁的旅行没有成为他取材的直接来源,但在编纂《史记》时,实地的印象很有可能影响到他的历史地理观、世界观、人物评价等。这样看来,本书《〈史记〉战国史料研究》虽然只能充当《史记》研究的序论,但同时也对《史记》取材和编纂作了一个总体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研究及其方法为了解《史记》的结构和历史观提供了一个基础。

此外,由于新出土资料的发现,为《史记》研究提供了可供补充的内容。本书日文版出版之际,历史研究领域关注的是睡虎地秦简等资料。后来研究者的重心转移到了2001年出版的新资料——张家山汉简。到了21世纪,湖南省龙山县的里耶古城出土了“里耶秦简”,这是了解秦代社会的珍贵资料。这批资料表明,到了秦代,郡县级别地方行政机构的文书传送已相当发达。此外还陆续出土了沅陵虎溪山汉简等司马迁时代以前的资料。

在思想史领域,马王堆汉墓帛书一直受到关注,近年先后公布的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的研究也大有进展。这些资

料是战国时代的典籍，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容成氏》记载了与《史记》不同的古传说。从这种情况来看，战国时代以前的历史传说也已经被文字化了。

由于这些简牍研究的进展，关于《史记》的取材可以作如下的补充说明。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等秦汉时代行政文书的增加，使我们能了解到丞相、御史大夫、廷尉和文书的关系。而《史记》几乎完全没有收录这类地方行政及司法方面的资料。相反收录得比较多的是纪年、历谱、系谱、占卜、典籍等，这些资料有的也从古墓出土过。从汉朝官府的角度看，这些资料绝大部分属于太史令所属的太常（奉常）的资料。由此可知，《太史公自序》所说的“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确是当时的实情。我们由此还可以理解《史记》当初为何被称为《太史公书》，并且可以知道司马迁所属官府和后代编纂历史书的史官所属官府是不同的。

我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通过分析《史记》中陈涉、项羽、刘邦的故事，我发现相同的社会形势也见于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奏谏书》等。到目前为止，《史记》中的故事只被看作是文学，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一直没能成为主流。但如果除去陈涉、项羽、刘邦等固有名词，这种资料其实正反映出当时一般民众所处的社会形势，也是一种史实。因此，今后的《史记》研究，不仅可以利用纪年、世系等历史记录，还可以利用作为史实来讲可疑的故事，将其与出土资料相比较，从而开辟古代社会复原的新途径。

我承认，《史记》研究只做战国史料的分析是不够的。因此，本书末尾追加了最近公开的出土资料文献目录，以及已译成中文的我的《史记》论文目录。我希望读者通过这些目录了解一些最新的状况和研究成果。

在此还要提到我本人与中国的学术交流。自从参加了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史记》研讨会以后，我还参加过司马迁及《史记》

方面的研讨会,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楚文化研究会等机构主办的研讨会,通过这些研讨会和中国学者促进了交流。1995年和2000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陈伟教授处,2000~2001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吴荣曾教授和蒋非非女士处,我都得到了研修机会,那时承蒙很多学者赐教。还有复旦大学的吕静女士,当初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找寻过出版社。能获得这么多交流的机会,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中译本的刊行让我想到,如果日本学界的研究只用日文发表的话,其成果很难为中国研究者所了解。所以,如果通过中译本的出版能为中日学术交流作出一些贡献,我会非常高兴。另外,我以前发表过《日本对〈史记〉的传承与研究》一文(收入《史记研究集成》第13卷《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华文出版社,2005年),介绍了日本的《史记》研究情况。我希望中国读者也能参考这篇文章,了解日本的《史记》研究及其方法。最后,向为我提供过帮助的人们,再次表达由衷的感谢。

藤田胜久

2006年7月于日本松山市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	---

序章 《史记》与战国史研究	1
一、战国史研究的史料	1
二、关于构成《史记》之资料的研究	3
三、文献研究与出土书籍	7
四、本书的结构与目的	10

第一编 战国史资料的基础研究

第一章 《史记》与中国出土书籍	21
前言	21
一、秦汉时代书籍之集散	22
二、中国出土书籍之概略	28
三、有关战国纪年、世系的资料	40
四、战国故事、传说等资料	48
结语	54

第二章 《史记》三家注所见《竹书纪年》佚文	65
前言	65
一、《史记》集解所引《竹书纪年》佚文	66
二、《史记》索隐、正义所见《竹书纪年》佚文	72
三、古本《竹书纪年》佚文的史料特征	78